■ 高教治理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5.007

国家文化距离促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了吗

李倩文,李　爽,李欣欣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大连　116024)

摘　要: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手段,对于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现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 Hofstede 的文化模型,采用实证分析法,从国家文化距离视角探索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中的文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与他国的文化距离既具有引力作用又具有推力作用,并且推力作用更强,表现为更大规模的学术人员是从中国流向美国、英国等与中国文化差异大且文化辐射力强的国家。进一步而言,文化距离的引力和推力作用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人员流动中更强,表现为在经济成本、交通成本得到补偿的前提下,国内学者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有更大规模的学术互动,以求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知识交流中增加学术创新;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成本、地理成本对学术人员流入我国的制约性作用凸显,同时他国的经济实力、语言差异成为我国学术人员国际流出的基础性引力,文化距离的引力和推力作用较弱。为了深入推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从深化流动认知、提升文化地位和分类制定政策 3 个方面提出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深入认识学术跨国流动和提高中华文化地位,扩大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和结合他国经济实力,分类制定学术国际流动政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家文化;文化距离;学术人员;国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5-0074-18

致谢:感谢 ICSR Lab 平台提供的 Scopus 数据库使用权;感谢相关工作人员丁世杰(Alvin Ding)和 Kristy James 对于 databricks 数据库使用的培训与指导;感谢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后马翔和辽宁师范大学刘叶老师的相关建议。

修回日期:2023-01-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行业特色高校优势学科溢出效应研究"(21YJC880003)

作者简介:李倩文,女,安徽淮北人,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教师评聘与流动研究;
李爽,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李欣欣,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价研究。

引用格式:李倩文,李爽,李欣欣. 国家文化距离促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了吗[J].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5):74-91.

Citation format: LI Qianwen, LI Shuang, LI Xinxin. Does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s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11(5): 74-91.

一、问题提出

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涉及出国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改革”。这既有利于学者在多元环境下碰撞思想、创新理念,进而助力学科发展[1],又能够驱动学术跨国合作、拓展研究视角[2],进而为我国构建和打造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3],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受到经济、社会、教育以及文化等多因素驱动,更好的学术职业发展[4]、更高的职业收入和适切的职业匹配度[5]是学者跨国流动的经济动机,更和睦的家庭关系[6]和人际关系、更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学者跨国流动的社会动因,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碰撞[7-8]是学者跨国流动的学术动机。不同方面因素构成的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实现时间离不开跨国流动过程中的文化偏好和适应过程。在微观层面,学者对于异域文化环境的感知差异、适应程度,既有可能成为其国际流动经济预期、社会预期以及学术预期实现的阻力,又可能成为动力。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会让跨国学术人员经历文化的隔离与适应,感受漂泊的思念与孤独[9],这种文化的调整期有可能延缓其多维度预期目标的实现时间[10-11];另一方面,来源国长期文化资本的积累又可能让学术人员在目的国享受到更优厚的待遇,激发热情,进而提升其他预期目标的实现效率[12]。因此,相比于其他因素,文化的影响更为复杂,更可能作为一个长期性变量,从更深层次影响其他因素的作用效果,这使得探索国家间文化差异对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影响更具有意义。

学术人员对异域文化的感知与适应,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文化差异以及文化政策存在联系。一国政府很难兼顾细微的个体文化适应过程,因而通过关注文化在宏观流动规模层面的作用来出台政策更具有指导性。为了深入推进国外学者来华、国内学者流出的互动交流,本研究基于 Hofstede 的国家文化模型,以我国学术场域为例,从宏观层面探索国家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的影响,一方面丰富从文化视角探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为回应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如何基于文化差异出台学术国际流动政策和措施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概念

在既有研究中,学术人员的定义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将学术人员定义为在高等教育机构、公共研究机构等场域开展学术研究的人员,主要指已经博士毕业的教师。该类研究主要通过高校教师官方网站爬梳教师履历信息获取流动数据,部分研究仅选取少数高校的几个学科教师而展开[13],这方面研究虽然更为细致,但是样本代表性不足。另一种是将学术人员界定为有过研究生教育经历或者有过科研从业经历的人员。该类研究对学术人员的界定更为宽泛,包括曾经或正在求学(工作)的本国或者外国国籍的学术人员[8]。该类研究根据作者跨国流动前后发文机构的国别变化来识别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能够获得关于国际流动的大规模代表性样本,适合宏观层面研究,常用 Web of Science[14]和 Scopus[15]数据库进行数据获取。

由于本文是聚焦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探索,因此采用更为宽泛的定义,即将学术人员定义为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者,具体包括已经在高校工作的教师、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博士后群体以及部分在学术系统从事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在具体操作方面,文章参考 Moed 等对活跃研究者以及我国研究生基本学制的规定,剔除总发文量少于 4 篇,或者发文生涯不超过 4 年的作者,尽可能保证研究样本中是能够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术人员。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则定义为学术人员以研究生升学、留学或职业变动的方式从某一国家机构转移到另一国家机构的过程,具体通过学术人员流动前后

发文机构隶属的国别差异来识别。

(二)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影响因素

回顾学界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研究脉络,不乏有对学者国际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的相关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术流动日益频繁,欧美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当时殖民关系和语言等因素在学术国际流动中的作用相对较大。如菲利普·G. 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所认为的,欧美作为学术中心,其所具有的特点包括语言实力的强大[16]。此外,有研究发现,在 19 世纪学术精英的国际流动过程中,国家的科学水平和知识发展趋势、高校的学科支撑度是显著的影响因素[7]。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美国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处于流动网络的中心,但以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正逐渐走向学术中心,使得殖民关系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在弱化,经济的影响力则变得更加重要[17]。

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国际合作步伐加快,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频率和规模。在国家层面,各国开始通过实施鼓励政策、成立专门机构、提供多方资金来促进国际交流,如日本实施的“年轻领导者”计划、法国专门成立流动机构、美国设立招揽英才的基金等,大大推进了学术人员的国际流动[18]。在高校层面,一方面,高校之间的战略结盟和国际合作规模日益扩大,成为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便捷途径和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国际经验和国际知识对提高学术竞争力、加强学科建设而言日益重要,为学术跨国流动提供了现实动力[19]。从个体微观层面来看,未来职业收入获得、学术职业发展也是影响学者跨国流动的主要经济动机[5],人际关系、家庭关系[4]、性别差异以及家庭嵌入等因素是学术人员流动的社会动机[20]。此外,文化也是影响学术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学者在经历初期的“文化休克”,适应了目的国的文化之后,可能与目的地国家产生黏性,进而被锁定在异国[11]。文化也可能是促进目标实现的资本,以新加坡的他国学术人员为例,来自欧美地区的学者基于其本土文化标签和积累的文化资本,在新加坡得到了更好的待遇[12]。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政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层面实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各省份对海外人才的项目设立和资金支持,成为海外人才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高端人才流向欧美等国的风险。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一方面,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解释力,其通过跨国知识迁移、培养和储备师资、积累社会资本、构建学术网络等促进了全球性学术系统整合,进而促使中国大学的崛起[21],成为高校鼓励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动因;另一方面,对世界一流院校的追求、科研生产力提升和个人学术职业发展是个体选择学术国际流动的动因。有研究发现,1950—1990 年的学者国际流动表现为向世界一流院校和顶级院校集中的发展态势[22]。与未发生国际流动的学者相比,流动对于科研产出数量、质量、贡献及合作的促进作用较大,流动到北美地区比流动到亚太、欧洲地区更有利于提升科研产出[13]。

综上所述,经济社会发展使得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变化。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微观层面的高校科研发展,个体层面的职业发展需求和文化适应逐渐受到关注。但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关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一方面,当前研究在宏观层面缺乏国际流动与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相较于经济和政治格局,文化格局间的互动及其作用力日益凸显,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政策所求。相比于政策措施对学术国际流动的助力,国家文化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然需要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微观层面跨国学者的经济收入提高、职业发展成效、人际关系融洽、学术知识获得等流动目的绝非短期积累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以学术流动人员

适应流入目的国整体性宏观文化为前提。跨国学者受到来源国长期文化熏陶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在与目的国整体的文化特征产生差异时,会影响其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学者在流动过程中的微观文化体验、文化适应与文化积累,注重小范围内的质性描述,缺乏从国家文化差异方面进行整体性大样本研究的量化补充。本文从宏观层面进行探索,弥补从国家整体文化差异方面探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量化研究的缺失。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基于推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国家文化距离相关研究进而构建研究框架。推拉理论源于莱文斯坦(Ravenstein)、博格(Bogue)以及埃弗雷特·李(Everett S. Lee)等学者的系列研究,他们认为人口流动受到"推力""拉力"以及"中间力"的共同作用,并且"力"是一个影响因素的集合,而非单一因素的作用[23-24]。此外,人口迁移规模与地域多样性、人口多样性有关。埃弗雷特·李认为,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越大,推力或拉力的作用就越强,流动所带来的收益或机会获得就越多,人口迁移规模就越大[25]。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领域,不可否认流动也是多因素所凝聚成的力的集合,因此本文在关注文化距离因素影响的同时,也考虑并控制如经济、语言、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构建推拉因素集。此外,学术人员国际流动是人口国际迁移的组成部分,难以脱离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基于埃弗雷特·李的观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力的作用就强,并且学术人员国际流动之后知识创新、学术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规模就可能越大。基于此,提出文章的总体假设:

假设1:国家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规模就越大。

流动是流入与流出的互动过程,并不仅仅是单向的,而人口国际流入、流出的规模并非是完全平衡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按各国政治经济地位,全球可分为中心国家、中间国家以及边缘国家,对于一国而言,流入和流出规模的差异与该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有关。阿特巴赫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认为学术流动也存在由学术边缘国家向学术中心国家流动的趋势,并且一国在中心边缘关系中的分布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26]。这就意味着一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因素在全球的位置可能引致学术人员流入、流出该国规模的差异。从文化角度而言,当前世界文化辐射力较强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这主要基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英语覆盖范围仍然最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等原因。与之相比,中国虽然不断通过建设孔子学院、鲁班工作坊等来传播中国文化和技能,但是文化传播力仍然不够[27],非洲文化圈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宣传程度则更弱。在这种文化辐射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学术人员对世界文化的了解程度有差异,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从文化宣传程度弱的国家流向宣传程度强的国家的促进作用较强。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2: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中,文化距离对学术流出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交流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规模的吸引作用更强。

在国家文化相关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国家文化的维度选取及国家间文化距离的度量。荷兰著名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是国际上从事国家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构建了衡量国家文化的6个维度①,并对国家文化进行整体性度量。6个维度分别是权力

① 权力距离是指组织或者机构中的成员对于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在相对不确定和模糊的环境条件下,行为主体能够采用正式规则来帮助避免威胁的程度;个人/集体主义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其中个人主义社会强调个性化和以自我为中心,而集体主义社会突出集体目标,强调奉献、团结和以集体为中心;男性/女性气质与一个社会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划分有关,其中男性化社会更加注重果断、抱负以及独立性等价值,而女性化社会表现为注重照顾、生活以及情感关怀等特征;长期/短期导向反映了社会对于时间观念的偏好,其中长期导向的社会存在一种注重未来收益的倾向,如注重储蓄和投资,将节俭和毅力视为美德,而短期导向的社会群体更注重过去和现在,注重及时行乐和消费;放纵/克制指的是某一社会对人基本需求与享乐欲望的允许程度。

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气质、长期/短期导向以及放纵/克制[28]。

根据霍夫斯泰德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国家文化度量结果,中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权力距离较大、集体主义倾向明显、有男性气质倾向、对于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并且注重长期导向的国家。但是这一结论引发了国内研究者的质疑,认为有些维度对中国文化的描述缺乏说服力。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中国的权力距离数值偏大,这一结论比较符合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征[29]。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有重视权力、权威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提到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尊卑关系等也隐含了权力的不对等。这种高的权力距离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另一方面起到了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第二,对于中国文化整体偏向集体主义特征的判断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中国社会最初以农耕为主,长期的农耕文化要求族群采用集体劳作、团结互助的生产方式,进而形成了以协商、谈判为表征的"和平相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集体主义精神在抗击疫情中也有所体现[30]。第三,对于中国文化具有长期导向的判断符合儒家文化中注重勤俭节约、个人修身齐家、养成坚韧品格的特征,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表征之一。

值得质疑的是,在男性/女性气质方面,Hofstede 对于男性气质的定义更强调获取金钱以及其他物质资料的程度。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强调为官、掌权,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则强调谦卑、维持关系,这更具有女性化的倾向。在不确定性规避方面,中国文化的得分偏低,低于美国、荷兰等国家,尤其低于邻国日本,这说明了中国整体上压力和焦虑感较低、充满好奇并且对于投资存在一定的风险偏好,且偏好程度高于美国、荷兰等具有探险文化的国家,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储蓄、相对谨慎与保守的文化特征不太相符。

因此,本文主要选取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以及长期/短期导向这 3 个对于中国文化更具有说服力的维度进行探索。当然,本文基于 Hofstede 团队的研究,把中国文化视为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等物质的文化,并不意味着这些"标签"就可以包含中国文化的所有特征,但在全球化时代采用一些相对简化的方式,既便于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也是关于学术研究参与国际对话的关键。最终,本文基于对推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文化距离等相关领域的整理与提炼,构建了研究框架(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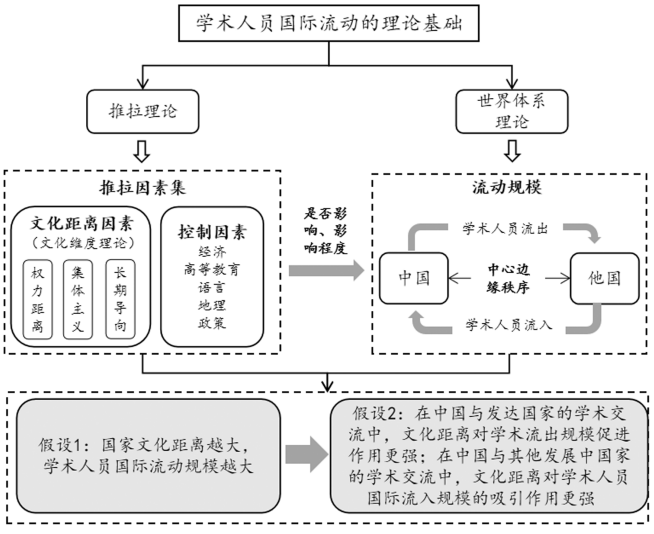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解释变量是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控制变量

包括语言是否一致、经济发展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地理距离、高等教育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变量说明如下:

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包括流入规模和流出规模两个方面,具体是指1990—2019 年每个年份其他国家流入中国和中国流入其他国家的学者数量。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数据来自全球最大的论文数据库 Scopus,通过 ICSR Lab 平台提供。ICSR Lab 是爱思唯尔面向科学计量学研究人员免费开放的数据科学平台。本研究团队采用 python-spark 语言,获取 1990 年以来作者发文机构由其他国家变更到中国、由中国变更到其他国家的作者相关信息。为了尽可能排除以境外短期求学为目标的研究生群体的干扰,借鉴 Moe、Payumo 等[15,31]的研究筛选出持续研究者。具体而言,剔除总发文量小于 4 篇或者 2017 年以前仅在连续的 4 年内有发文记录的学者①,并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入和流出中剔除存在学术人员回流模式的成员 12 824 人,最终获得从 71 个国家流入中国的 71 659 名学者和从中国流出到 69 个国家的 113 634 名学者数据。将作者数据按照国家、年份累加,计算出每年度每个国家流入中国和从中国流出到每个国家的学者数量。

国家文化距离。本文基于 Hofstede 的国家文化数据库构建指标进行度量。Hofstede 的国家文化的问卷包括 33 个题目,具体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家庭价值观等,体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文化的特征,最终提炼的维度通过聚类和因子分析归纳而成。参考 Kogut 和 Singh[32]、Pierce Morosini[33]计算国家文化距离的公式,本文将国家文化距离的公式设置如下:

$$x_{\mathrm{CulDist}_{kj}}=\sqrt{\frac{(I_{kC}-I_{kj})^2}{V_k}}$$

其中,$x_{\mathrm{CulDist}_{kj}}$ 代表在 k 维度中国与 j 国家的文化距离;I_{kC} 代表中国在 k 维度中的文化得分,I_{kj} 表示 j 国家在 k 维度的文化得分,V_k 表示所有样本国家中 k 维度文化得分的方差。国家文化得分数据来自 *Hofstede* 的官方网站,其中包括不同国家文化得分比较的数据。

语言因素。语言属于文化层面的具象化因素,其对海外留学生的学术交流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存在差异。对于学术人员国际交流而言,外语能力的掌握是学术国际交流的必备技能之一。本文设置语言是否相同的虚拟变量,“是”取 1,“否”取 0。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

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 1990—2019 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照美元计价)和购买力平价(PPP)方式计算的人均 GDP 作为经济衡量指标。其中 GDP 可以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购买力平价反映了实际产品的价格,代表在该国生活需要负担的经济成本。理论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学术国际流动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以 PPP 计算出的人均 GDP 对于学术国际流动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将二者的值取对数之后作为经济因素衡量标准。

高等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国家的高等教育实力是影响学术国际流动的重要因素。目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越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越多,目的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支配的资金就越多,教育环境、科研条件等也更好。参考魏浩等人的研究,采用高等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作为高等教育水平的代表因素,本研究抓取了该数据集中在 1990—2019 年的数据用以说明。

地理因素。地理因素指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一般而言,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用两国首都

① 剔除论文总数在其发文生涯中低于 4 篇的作者,这个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可剔除发文不活跃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学生。剔除在 2017 之前,第一次发文和最后一次发文年份小于 4 年的作者,这进一步剔除学术研究过程中发文持续性低的学术人员,尤其是已经退出学术领域的硕士和部分博士研究生。

之间的直线距离表示。本文选择其他国家首都与中国首都北京之间的距离,除以 1 000 之后作为国家地理距离的衡量指标。这方面的相关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

国家政策因素。中国于 2015 年开始正式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根据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网站,截至 2022 年 8 月,中国已经与 149 个国家签订合作文件。本文的数据集覆盖 2019 年,构建了流出国或者目的国是否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虚拟变量,“是”取 1,“否”取 0。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关于面板数据,一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采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进一步进行确定。在总样本层面,对权力距离、个体/集体主义、长期/短期取向 3 个维度的学术人员国际流入和流出 6 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6 个模型的 p 值均小于 0.01,说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估计参数存在显著差异,拒绝“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与个体、时间效应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对所有维度回归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时间和个体(洲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y_{acamob} = C_0 + C_1 \times x_{CulDist} + C_2 \times x_{language} + C_3 \times x_{lnGDP} + C_4 \times x_{lnPPP} + C_5 \times x_{exptogov} + C_6 \times x_{distance} + C_7 \times x_{B\&R} + u + v + \varepsilon$$

在该模型中,y_{acamob} 代表每年由其他国家流入中国或者由中国流出的学者数量;$x_{CulDist}$ 代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x_{language}$ 代表其他国家语言与中国语言是否一致;x_{lnGDP} 和 x_{lnPPP} 代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力平价;$x_{exptogov}$ 代表高等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x_{distance}$ 代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x_{B\&R}$ 代表国家的“一带一路” 倡议,即该国家是否为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u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v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均为洲层面的;ε 是随机扰动项。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这两个关键变量进行描述分析。

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方面,为了明晰不同国家、不同年份与中国学术流入和流出规模的差异,将数据结果进行展示。表 1 展示的是在 1990—2019 年的 71 个流入和 69 个流出样本国家中,与中国有关的学术流入和学术流出的前 10 名国家。中国学术流出和学术流入最大的目的国和来源国均为美国,且规模远超其他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学术流出和流入国中,美国仍居首位;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流出和流入中,巴基斯坦均位列第一。

表 1　与中国有关的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前 10 名的国家

	学术流入规模	学术流出规模
发达国家	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法国、荷兰、意大利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国、荷兰、瑞典
发展中国家	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泰国、南非、马来西亚、巴西、埃及、土耳其
全部国家	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法国、巴基斯坦、荷兰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国、荷兰、瑞典

从时间变化来看,如图 2 所示,1990—2019 年与中国有关的学术人员流入和学术流出规模是逐步提高的,但从总体上来说,学术人员流出的规模大于流入。在学术人员流出维度,1990— 2019 年由

中国流向发达国家的规模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且差距仍在拉大。与此同时,由发达国家流入中国的学术人员规模大于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入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5 年起,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入中国的学术人员数量有小幅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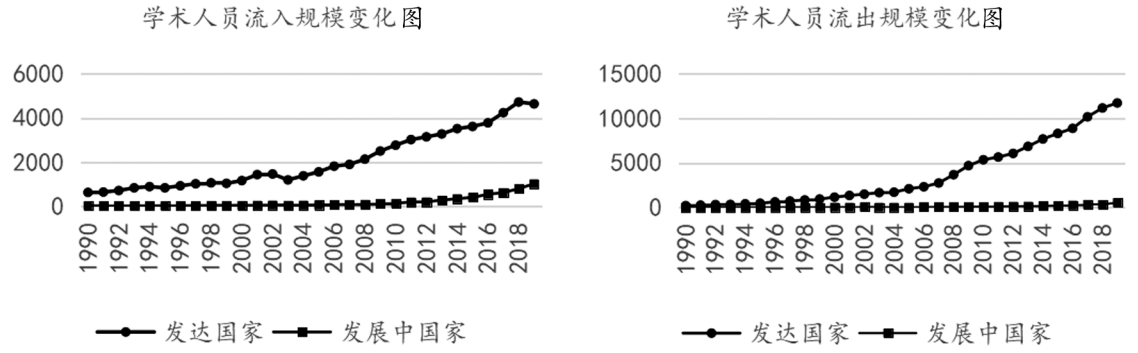

图 2　学术人员国际流入和流出规模变化图

在文化距离方面,从 3 个文化维度筛选出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近和最远的 5 个国家(见表 2)。整体上,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近的发达国家有新加坡、日本、韩国、斯洛文尼亚等,这说明受儒家文化圈影响越深的国家与中国文化整体上更为接近;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孟加拉国、泰国、俄罗斯等;与中国文化最远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与中国文化最远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南非、波多黎各、印度等。

表 2　不同文化维度下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近和最远的前 5 名国家

		权力距离维度	个人/集体主义维度	长期/短期导向维度
距离最近	发达国家	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波兰、比利时、法国	新加坡、韩国、斯洛文尼亚、葡萄牙、希腊	日本、德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
	发展中国家	孟加拉、加纳、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墨西哥	孟加拉、泰国、亚美尼亚、智利、秘鲁	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保加利亚
	全部国家	孟加拉、加纳、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墨西哥	孟加拉、泰国、新加坡、亚美尼亚、韩国	乌克兰、日本、德国、立陶宛、爱沙尼亚
距离最远	发达国家	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新西兰、冰岛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	澳大利亚、爱尔兰、美国、冰岛、葡萄牙
	发展中国家	南非、阿根廷、巴基斯坦、伊朗、赞比亚	南非、印度、阿根廷、摩洛哥、伊朗	波多黎各、加纳、埃及、尼日利亚、哥伦比亚
	全部国家	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新西兰、冰岛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加拿大	波多黎各、加纳、埃及、尼日利亚、哥伦比亚

(二)回归分析

1. 全样本视角的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 1~6 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分别为 2.75、2.77、2.28、3.34、3.36 和 2.92,均小于 10,因此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表来看(见表 3),文化距离对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整体上起到了显著正向作用,当文化距离增加一个单位,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分别增加 13、22、8、67、99 和 76 个单位,这说明与中国文化距离越大,与中国进行学术人员国际交流的规模往往就越大。这一研究结论也验证了本文的总体假设,表现为国家文化距离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入方面起到了拉力作用,而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出

方面又起到了推力作用。学术职业是一个需要发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职业,不同的国家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知识彼此迁移与交流,可以增加知识创新的机会,从而表现为“文化差异越大,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越大”这一现象,这与埃弗雷特·李在人口流动规模方面的观点相契合。

表 3　全样本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回归表

变量名称	学术人员国际流入			学术人员国际流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权力距离维度	13.15***			67.28***		
	(2.71)			(14.57)		
个人/集体主义维度		22.48***			99.39***	
		(3.58)			(20.09)	
长期/短期导向维度			7.50***			75.98***
			(2.48)			(18.67)
语言是否一致	27.56***	28.11***	26.80***	146.60***	132.90***	110.30***
	(8.89)	(8.79)	(7.45)	(33.35)	(28.92)	(29.37)
经济发展水平	28.87***	25.19***	39.31***	97.37***	78.30***	143.80***
	(2.08)	(1.76)	(3.39)	(17.31)	(14.07)	(27.39)
购买力平价	4.68*	3.66	6.64***	16.73**	15.05**	61.70***
	(2.62)	(2.44)	(1.93)	(7.33)	(6.87)	(12.53)
地理距离	−5.47***	−6.42***	−1.74***	2.90	−2.66	5.23**
	(1.07)	(1.17)	(0.44)	(4.02)	(4.03)	(2.39)
高等教育占公共支出比例	−0.07	0.21	0.53**	1.37	2.56**	3.95***
	(0.23)	(0.24)	(0.23)	(1.00)	(1.09)	(1.23)
“一带一路”倡议	3.94	12.81***	3.87	51.55**	92.07***	40.93*
	(4.00)	(4.88)	(4.03)	(24.58)	(31.31)	(21.38)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洲际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63.7***	−671.1***	−1 084.6***	−2 967.2***	−2 493.0***	−4 711.9***
	(55.27)	(49.29)	(101.2)	(501.6)	(424.3)	(891.2)
N	1 309	1 309	1 309	1 102	1 102	1 102
R^2	0.537	0.550	0.405	0.314	0.323	0.235

文化差异在促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时更为显著,通过系数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权力距离维度、个人/集体主义维度还是在长期/短期取向维度,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促进的系数均高于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的系数,说明相比于海外来华学者,中国大陆学者更有可能去文化差距更大的国家。这一点可以用世界体系理论进行解释。根据描述性统计,从国内流出的学术人员绝大多数去了欧美国家,这说明中国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辐射力,但在文化宣传力方面还逊色于美国等掌握国际话语权国家。基于此,中国大陆的学术人员选择了解美国、英国等文化的机会更多,所以,客观而言,在与欧美发达国家互动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流出规模的促进作用要比流入强。

在语言方面,回归结果发现,整体上语言一致对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入和流出的规模都起到显著促

进作用。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与中国语言相似的国家,其与中国的学术交流规模相较其他国家更大。有研究认为,语言属于文化的一个要素,可以作为文化的一个度量指标。需要注意的是,语言虽然可以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但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性的文化气质。一国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不是该国的语言可以完整体现甚至代替的,语言的学习也难以从根本上缩小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因此,研究中发现的"语言一致可以促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与"国家文化差异更有利于促进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两者指的是文化的两个方面,并不冲突。这方面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少国家学者为了感受文化差距较大国家的学术研究方式,会克服语言的障碍,选择去文化差异较大的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学习和研究。

在经济因素方面,一国 GDP 对于其与中国的学术国际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说明经济实力越强,对于学术交流的投入就可能越多,出台的政策相应也就越多,越有可能促进学术交流。此外,经济成本对于学术人员流入整体上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相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而言偏弱,这说明他国学术人员来华整体上并未受到经济成本阻碍。研究也发现,中国大陆学术人员流出规模受到的经济成本制约更小。地理距离对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入起到负向影响,但是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他国高等教育支出占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具有一定正向影响,说明他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其高等教育领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基于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依据经合组织的概念界定对研究所涉的国家样本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探讨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影响程度及其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关系,具体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权力距离维度	24.76***			20.04***		
	(3.82)			(5.68)		
个人/集体主义维度		27.49***			7.662***	
		(4.41)			(2.30)	
长期/短期导向维度			26.34***			−1.09
			(4.36)			(1.09)
语言是否一致	137.20***	45.67**	108.70***	−2.61	2.71	1.54
	(23.16)	(17.86)	(13.98)	(3.16)	(2.51)	(2.61)
经济发展水平	40.01***	33.82***	63.55***	3.60***	3.76***	4.67***
	(2.68)	(2.48)	(4.39)	(0.85)	(0.91)	(0.90)
购买力平价	−47.07***	−18.46**	−5.89	−11.88***	−8.77***	−7.79***
	(10.45)	(7.39)	(13.64)	(2.84)	(2.04)	(1.98)
地理距离	3.16	5.87**	0.36	−0.82**	−0.54*	0.047
	(2.32)	(2.31)	(1.45)	(0.33)	(0.32)	(0.35)
高等教育支出	−2.11***	−0.40	0.94*	0.580***	0.474***	0.367***
	(0.49)	(0.41)	(0.50)	(0.13)	(0.11)	(0.11)
"一带一路"倡议	−20.33***	−0.76	11.94	−6.20**	2.11	−0.18
	(5.69)	(5.94)	(7.95)	(2.68)	(3.05)	(3.38)

续表

变量名称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洲际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42.7***	−673.0***	−1666.8***	−3.634	−29.40	−52.36***
	(111.5)	(107.4)	(198.2)	(24.06)	(18.02)	(17.09)
N	755	755	755	554	554	554
R^2	0.720	0.719	0.588	0.292	0.247	0.238

表 5　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权力距离维度	76.95***			11.65***		
	(17.12)			(4.17)		
个人/集体主义维度		10.31			−2.89**	
		(14.23)			(1.17)	
长期/短期导向维度			140.20***			−0.99
			(30.04)			(0.68)
语言是否一致	668.20***	438.30***	291.90***	−5.16**	−2.99*	−3.04**
	(99.19)	(63.34)	(50.61)	(2.05)	(1.56)	(1.54)
经济发展水平	114.20***	108.90***	205.80***	1.99***	2.45***	1.85***
	(18.96)	(18.68)	(35.69)	(0.45)	(0.55)	(0.49)
购买力平价	−78.96**	27.83	187.60***	−2.44	−0.09	−0.26
	(32.15)	(30.45)	(59.02)	(1.79)	(1.196)	(1.166)
地理距离	3.28	−3.82	25.59***	−0.06	0.17	0.21
	(8.38)	(8.08)	(6.92)	(0.20)	(0.21)	(0.24)
高等教育支出	−10.84***	−6.18***	2.52	0.06	−0.09	−0.02
	(2.31)	(1.58)	(1.65)	(0.07)	(0.06)	(0.06)
“一带一路”倡议	−36.53	−5.31	103.70**	−0.77	1.06	1.68
	(23.66)	(25.73)	(41.45)	(1.01)	(1.38)	(1.45)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洲际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365.1***	−3 241.4***	−7 844.0***	−30.68*	−53.46***	−39.03***
	(634.0)	(738.1)	(1 544.5)	(15.88)	(14.50)	(14.27)
N	709	709	709	393	393	393
R^2	0.414	0.410	0.349	0.247	0.184	0.180

综合表4和表5可以发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交流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的影响程度更大,验证了假设2。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各国文化宣传程度在全球的位置不同,文化距离对促进学术人员从文化辐射力弱的一方到文化辐射力强的一方的作用更强,这也体现了提高国家文化宣传力的重要性。

单从每个表的回归结果看,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入方面,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文化距离对发达国家学术人员流入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根据模型4至模型6,文化距离对学术国际交流规模的影响系数要么较小,要么不显著,而地理距离系数显著为负,他国高等教育支出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相比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学术人员来华受到了一定的交通成本、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等影响,弱化了文化距离的作用。因此,在解决成本抵扣、增加投入的基础上,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的引力作用可能更强。

在学术人员国际流出方面,根据模型1和模型4、模型3和模型6,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中同样显著。这说明,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文化距离的接受度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影响。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学者会选择去文化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在集体主义这个维度得到了有效验证(参照模型5)。这也印证了世界体系理论的部分观点,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强,文化辐射力不够,国内学者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对相关国家文化缺乏了解,导致流出规模较低。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稳健性检验选择将学术国际流动规模滞后一期重新回归,即便如此,文化距离的影响依然显著,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的预期整体上一致(见表6)。

表6　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滞后一期回归分析

	学术人员国际流入规模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权力距离	14.63***			23.34***			24.01***		
个人/集体		22.03***			26.70***			7.43***	
长期/短期			−2.14			17.30***			−1.76
语言是否一致	35.08***	32.39***	16.23*	107.90***	21.39	37.48**	−1.37	2.53	1.15
经济发展水平	34.99***	30.71***	33.60***	45.06***	39.20***	47.40***	3.16***	3.71***	4.66***
购买力平价	5.16*	5.58**	14.30***	−35.88***	−8.81	8.75	−12.97***	−8.26***	−7.18***
地理距离	−4.85***	−6.63***	−5.20***	5.69**	7.92***	2.79	−0.21	−0.34	0.44
高等教育占比	−0.11	0.16	0.22	−1.06**	0.59	0.09	0.50***	0.34***	0.26**
“一带一路”倡议	6.07	15.92***	4.92	−15.36***	4.63	−3.47	−9.89***	2.27	−0.37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权力距离	70.77***			85.70***			10.30***		

个人/集体		91.57***			6.71			−2.30*	
长期/短期			46.61***			78.60***			−1.74*
语言是否一致	185.20***	153.20***	134.40***	661.70***	390.90***	375.90**	−5.80***	−4.20**	−4.60***
经济实力	121.90***	101.00***	126.60***	123.10***	119.40***	137.70**	1.86**	2.10**	1.26
购买力平价	27.88***	30.06***	74.85***	−60.19*	65.30*	117.00**	−2.02	0.24	0.05
地理距离	5.28	−1.57	−12.10***	5.87	−2.31	−7.06	−0.07	0.03	0.21
高等教育占比	1.35	2.52**	2.22*	−10.40***	−4.68***	−4.70***	−0.04	−0.20**	−0.10
“一带一路”倡议	63.90**	102.00***	70.71**	−36.72	6.53	22.10	0.04	1.26	1.65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将“高等教育支出占比”替换为 2022 年 QS 公布的 1 300 所高校,以不同国家的高校数量代表不同国家的学术实力。其中,美国高校数量最多,英国其次,基本符合全球学术中心的趋势。替换之后,发现国家学术实力对学术人才流动的影响非常显著,同时文化距离的影响仍然显著(见表 7),说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 7　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规模替换变量回归分析

学术人员国际流入规模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权力距离	7.42***			8.31***			19.26***		
个人/集体		3.77*			4.59			3.66**	
长期/短期			0.83			2.53			1.51
语言是否一致	17.08*	13.30	22.96**	37.76***	22.64	79.79***	0.88	3.49	1.22
经济发展水平	−5.63***	−6.48***	−4.99***	−2.60	−4.54**	−1.11	3.07***	3.52***	3.60***
购买力平价	10.88***	14.00***	9.46***	−4.55	6.54	13.06**	−10.97***	−7.98***	−8.01***
地理距离	−4.68***	−5.24***	−2.77***	2.37	1.46	−4.60***	−0.33	−0.05	0.01
学术实力	2.46***	2.46***	2.69***	2.25***	2.26***	2.68***	0.19	0.25**	0.39***
“一带一路”倡议	−9.29***	−8.41***	−7.68***	−29.20***	−26.70***	−21.60***	−6.75***	2.10	3.21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术人员国际流出规模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权力距离	35.44***			15.53			10.96***		
个人/集体		22.30***			−63.50**			−2.85***	

长期/短期			27.20***			38.01***			-0.90
语言是否一致	117.70***	102.30***	111.20***	269.40***	269.60***	278.80***	-4.75***	-4.47***	-3.22**
经济实力	-47.50***	-52.50***	-47.20***	-37.00**	-32.30**	-27.22*	1.83***	1.84***	1.73***
购买力平价	30.80***	42.10***	48.10***	30.89	78.39**	103.90**	-1.87	-0.53	-0.50
地理距离	2.67	-0.73	0.94	2.46	-13.60*	11.68***	-0.17	0.28	0.20
学术实力	8.84***	8.80***	9.88***	7.99***	8.30***	9.33***	0.02	0.16***	0.06
“一带一路”倡议	-22.08**	-14.61	-30.60***	-61.30***	-85.20***	-49.80***	-1.16	3.07***	2.85***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借助1990—2019年学术国际流动的数据,基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及其文化数据库,选取对中国本土文化最具说服力的3个维度,探索了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文化距离整体上促进了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的规模,这一结论无论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还是长期导向等文化各维度均成立。该结论虽然与文化距离对于其他一般劳动力跨国就业[34]产生的阻碍作用相悖,但是恰恰体现了学术职业群体的特殊性。学术职业以知识创新和发展为旨趣,不像其他一般劳动力那样侧重对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加州理工大学校长曾提出“多样性产生创造性”这一观点。西方绝大多数高校把多样性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甚至成立专门的多样性委员会,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文化环境的学者提供支持与保障。因此,在学术人员国际交流中,文化差异存在引力,而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才让不同文化主体及个人有更大的相互学习空间,才可能产生更为创新的想法,这也与埃弗雷特·李关于“社会文化环境对人口流动规模具有促进作用”的假设相一致。

其次,在与发达国家的学术国际互动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流出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国际互动中,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国际流入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根据世界体系理论,这种差异反映了在既有的世界格局之下不同国家文化辐射力的差异。以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从英美等发达国家流入、流出中国的影响差异为例,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大的美国、英国等国家,文化宣传力度大因而文化辐射力强,因此中国大陆学者就会有更多机会接触美国、英国文化,能够提前做好文化适应准备,去了解他国的学术研究方式与氛围,学术人员国际流出的规模也越大。中国文化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定的普及度,但是并没有这些国家强势,因此相比于流入中国的,由中国流出到美国、英国等文化辐射力较强国家的学术人员更多,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后,文化距离对学术人员流动规模的强促进作用以较强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前提。综合国力强的发达国家,本身就存在基于经济实力的引力,同时这种经济实力又可能支撑起较大的文化宣传力度,使其国家文化为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学术人员所感知和了解,尤其可能使学术人员对该文化环境下

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方式产生好奇,进而促使更大规模的学术人员国际互动。相比于发达国家,文化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人员国际流动起的作用不大甚至阻碍学术国际流动,尤其是国内学者更有可能流向与中国同为集体主义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经济基础弱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小、文化宣传力度较弱,使得他国学术人员对其国家文化了解的机会少,成本因素成为制约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术国际交流的主要因素。最为明显的就是交通成本,在发达国家中,地理距离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学术流动中,地理距离要么产生负向影响,要么并未产生影响。因此,只有提升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实力,才可能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进而借助文化较实力扩大学术国际交流规模。

(二)政策建议

学者的学术国际交流不仅是自身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为学术创新做出贡献。本研究结论表明,他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于学术人员国际流动存在重要影响,并且影响程度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学术人员国际交流,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深化流动认知、提升文化地位和分类制定政策 3 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深刻认识学术跨国流动

本研究立足中国场域,发现文化距离整体上可以促进他国与中国大陆学者的交流。这一结论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从经济驱动视角推动学术人员国际交流的途径,说明宣传和彰显中国整体文化风貌在学术国际流动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需要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悟与学术人员国际流动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学术人员的跨国流动。

首先,深化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学术人员的视野不仅要聚焦于专业领域知识,还要对中国本土文化有一定的认识,认知到中国的特色、优秀文化的价值,保持文化特色。同时也需要理解目的国的文化环境,认识文化差异,在对各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专业交流。

其次,将知识迁移与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深化对知识迁移的认识。知识生产与国家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学术国际流动伴随着知识的迁移,但是这种迁移不是表面上的方法、措施的引入,需要结合本土社会情景深入理解其适切性。尤其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理论的构建与社会文化情景的关系更大,更需要在深入理解不同国家文化情景的基础上,引入他国的知识和理论,产出更加符合我国文化情景的优秀成果,避免过度借鉴造成理论迁移的“水土不服”。

2.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地位,扩大学术国际流动规模

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到中国、从中国到发达国家学术人员流动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反映了世界格局中文化地位的差异对文化距离促进作用的影响。所以对中国而言,提升国际地位,加大文化宣传力度,是加速对外开放、扩大学术国际流动规模的重要途径。

首先,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征,可以通过扩大汉语的普及程度来提升国际文化地位。研究发现,语言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整体上起到了阻碍作用,很多学者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由于中国已经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孔子学院以及鲁班工坊,而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又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教授汉语和中国技能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因此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多举措。例如,扩大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规模、保证汉语学习质量、提高外国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等。同时,可以继续尝试搭建其他的汉语推广平台,如支持华侨同胞开设汉语学院,协助自主开办的学校步入正轨,在教材、教师培训、文化体验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

其次,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学术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考虑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寻找和培养同时精通我国通用语言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双语人才,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文化传播和宣传工作。此外,可以尝试根据学术交流的目的国和来源国对学术交流人才的不同要求,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高校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提高学术国际交流频率,实现学术共同发展。

最后,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结合国内区域文化特色,通过建立与邻国的文化联盟来扩大学术人员流入规模。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人员流入规模产生阻碍作用,可以基于文化距离考虑推动中国与相邻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人员交流。例如,可以借鉴每年在广西举行的东盟博览会的形式,将与俄罗斯、蒙古接壤的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与越南、柬埔寨等接壤的广西、云南等省份划分为文化、学术交流特区。这些省份与相邻国家进行交流具有语言和文化优势,比较容易在文化上进行切磋和磨合。此外,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解决他国学术人员来华的交通成本问题,为域外学者了解我国历史文化和学术动态提供便利,丰富双边文化和学术交流形式,让边境线成为文化宣传、学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加速扩大学术人员国际交流规模。

3. 结合他国经济实力,分类制定学术国际流动政策

文化距离对学术国际流动规模的影响受到国家发展水平的制约,文化距离对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流动规模的推动作用更强。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考虑结合他国经济实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距离,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尝试制定不同的学术国际流动政策。

针对发达国家,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从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入手,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让更多学者关注到中国的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完善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等制度规范,为想要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提供资金支持,提供物质保障。针对发展中国家,可以先从与中国文化特征相近的国家入手,深入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平等的态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和对话,与其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广泛联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学者互访、联合培养、学术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活动。

参考文献:

[1] 于海燕,张海娟. 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国际化过程分析[J]. 高教探索,2012(3):71-77.

[2] 魏立才,黄祎. 学术流动对回国青年理工科人才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 论文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1):67-73.

[3] 黄福涛.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2017,38(8):1-9.

[4] 李梅. 中国留美学术人才回国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17,15(2):79-86.

[5] CAPARROS R A. Doctorate holders’ careers in Spain: doe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matter[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19,54(1):117-136.

[6] YIEH T. The adjust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51-81.

[7] 宋旭璞,潘奇. 学术精英国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历史数据的实证探索[J]. 全球教育展望,2019,48(5):27-38.

[8] 李子璇,杨波. 中国科研人员的国际流动趋势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6):25-34.

[9] 王炳钰,陈敬复,吴思莹. 流动想象与学术移民:中国回流学者工作与生活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20(2):199-211.

[10] TZANAKOU C. Stickiness in academic career (im) mobilities of STEM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an insight from Greece[J]. Higher education,2021,82(4):695-713.

[11] PUSTELNIKOVAITE T. Locked out, locked in and stuck:exploring migrant academics' experiences of moving to the UK[J]. Higher education,2021,82(4):783-797.
[12] SIDHU R, YEOH B, CHANG S. A situated analysis of 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capital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of transnationally mobile scientists in Singapore[J]. Higher education,2015,69(1):79-101.
[13] 陈丽媛,荀渊. 学术人才国际流动如何影响科研产出:以四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经济学科为例[J]. 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1):11-19.
[14] ROBINSON G N, SUGIMOTO C R, MURRY D, et al. The many faces of mobility:using bibliometric data to measure the movement of scientists[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19,13(1):50-63.
[15] MOED H F, PLUME A. Studying scientific migration in Scopus[J]. Scientometrics,2013,94(3):929-942.
[16] 魏浩,赖德胜. 文化因素影响国际留学生跨国流动的实证研究:兼论中国扩大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战略[J]. 教育研究,2017,38(7):55-67.
[17] BARNETT G A, WU R Y.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1970&1989[J]. Higher education,1995,30(4):353-368.
[18] 彭伟强,冯增俊. 发达国家教育人员国际流动探讨[J]. 高等教育研究,2001,22(6):104-109.
[19] 汪怿. 学术人才国际流动及其启示[J]. 教育发展研究,2006(7):34-39.
[20] HENDERSON E F. Sticky care and conference travel: unpacking care as an explanatory factor for gendered academic immobility[J]. Higher education,2021,82(4):715-730.
[21] 沈文钦. 国际学术流动与中国大学的发展: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历史审视[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4):47-70,186.
[22] 徐娟,毕雪妮. 大学高层次人才生成中国际学术流动及演变:基于我国 5 类项目人才履历的实证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2021,43(3):94-101.
[23]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48(2): 167-235.
[24] BOGUE D J, ANDERTON D L, BARRETT R E.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M]. NY: Simon and Schuster,2010:103-130.
[25]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1966,3(1):47-57.
[26] 菲利普·阿特巴赫,利斯·瑞丝伯格,劳拉·拉莫利. 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 姜存国,喻恺,张蕾,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1-32.
[27] 王智洋. 当代城市文化感知与建构中的"游荡性"特征[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5):91-102.
[28]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 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 李原,孙健敏,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29.
[29] 陈东平. 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 江淮论坛,2008(1):123-127.
[30] 张立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抗击疫情中的价值[J]. 河北学刊,2022,42(4):54-61.
[31] PAYUMO J G, LAN G, ARASU P. Researcher mobility at a US 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J]. Research evaluation,2018,27(1):28-35.
[32] KOGU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33] MOROSINI P, SHANE S, SINGH H.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29(1):137-158.
[34] 周芬芬,罗光强. 文化距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影响[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6): 56-61.

(编辑:杨慷慨 校对:蔡华健)

Does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s

LI Qianwen, LI Shuang, LI Xinxi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Da 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 staff,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mportant for expanding the open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univers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Hofstede´s cultural model,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as both gravitational and thrust effects, and the thrust effect is stronger, as shown that there is a larger scale of academic flows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culturally different from China but have stronger cultural radiation. Further, the gravitational and thrust effe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flow of academic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e premise that economic cost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are compensated fo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costs are more negative on the inflow of academic staff to China, while the economic strength and language differ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become the basic gravitational for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outflow of academic staff in China, and thus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is weak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academics, suggestions were further put forward in three area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mobility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sition to expand the scale of academic mobility and formulating specific academic mobility policies based on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es; cultural distance; academic staff; international mobility